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盘江民族 识略

PANJIANGMINZUSHILUE
——贵州兴仁人类学
调查与研究



何国强 陈华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中国田野调查丛书

盘江民族识略

——贵州兴仁人类学调查与研究

Panjiang Minzu Shilue

Guizhou Xinren Renleixue Diaochoa yu Yanjiu

何国强 陈华 主编

知识产权出版社

内容提要:

本书是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师生深入西南少数民族地区进行人类学田野调查的报告集——“中国田野调查丛书”之一。

本书叙述了贵州兴仁苗族(黑苗)、彝族、布依族的体质特征和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后者包括政治权力与控制、生育文化与保健、婚姻与家庭结构、谋生方式、精神文化生活、民族服饰、民间文学艺术、初等教育和旅游开发等各个层面。本书丰富了人类学研究的资料库,也为研究西部经济与少数民族文化提供了翔实、细致的参考依据。

责任编辑:马岳 装帧设计:段维东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盘江民族识略——贵州兴仁人类学调查与研究/何国强,陈华主编. —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 2008. 4

ISBN 978-7-80247-292-1

I. 盘… II. ①何… ②陈… III. 少数民族—民族人类学—调查研究—兴仁县 IV. K280.73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8)第059778号

盘江民族识略——贵州兴仁人类学调查与研究

何国强 陈华 主编

出版发行: 知识产权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海淀区马甸南村1号

邮编: 100088

网址: <http://www.ipph.cn>

邮箱: zscq-bjb@126.com

发行电话: 010-82000893 82000860 转 8101

传真: 010-82000893

责编电话: 010-82000860 转 8325

责编邮箱: mayue119@139.com

印刷: 知识产权出版社电子制作中心

经销: 新华书店及相关销售网点

开本: 787mm×1092mm 1/16

印张: 28.125

版次: 2008年8月第一版

印次: 2008年8月第一次印刷

字数: 520千字

定价: 86.00元

ISBN 978-7-80247-292-1 / G · 267 (10218)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总序

周大鸣

历史是一条流动的河。20世纪30年代，中山大学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人类学硕士。198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复办以后，成为我国第一个具有本科、硕士、博士的教学单位。20多年来培养的人类学本科、硕士和博士生超过1000名，其中不乏国内人类学界的中坚力量。一批批人类学毕业生，带着探索人类从哪里来、人类将走向何方的梦想踏入人类学的大门，又带着或许更多的追问去开创21世纪中国人类学研究的新局面。

回顾中山大学人类学办学近80年的历史，坚持脚踏实地的田野调查已成为我们的传统和特色。每次田野调查都会积累很多好的经验，留下很多好的传统和故事，有些至今还经常被人提起。例如，1928年杨成志先生独闯凉山对彝族进行了一年多的调查，回到昆明时，时任云南省主席的龙云给他题词，称之为“孤胆英雄”！哪怕是在抗战时期，中山大学颠沛流离在澄江、坪石，人类学的学生们仍深入西南地区调查瑶、傣、黎、壮等族。20世纪80年代初，梁钊韬先生虽年迈体弱，仍亲自到四川为其博士生格勒选点并耳提面命田野调查的方法；容观复先生68岁高龄时仍率学生到海南岛深入黎族村寨进行调查；1991年中山大学人类学系大三学生赴海南省通什毛阳镇进行调查，黄淑娉老师和龚佩华教授不顾年高，以顽强的毅力克服晕船带来的折磨，跋山涉水，亲率学生深入黎族群众；2004年夏天，已经是73岁高龄的黄淑娉教授亲率两名学生深入到海陆丰畲族地区——黄先生40年多前调查过的地方进行回访……这样的故事，不胜枚举。学生们在田野调查中，从老师身上学到的不仅仅是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不仅仅是对社会文化的研究，更是一种对学术的执著精神和做人的道理。

作为以异文化研究起家的文化人类学来说，不深入实地进行调查无异于纸上谈兵。田野调查虽然被国内人类学者和相邻学科广为接受，但在中国讨

论如何深刻地认识田野工作的意义、如何真正地做好田野工作仍有非常现实的意义。

首先，涉及田野调查的目的和基本要求问题。人类学田野工作是用直观的方法观察人类行为，通过介入式的经历以及与不同社会人们的深入交往来研究一种文化。尽管人类学田野调查有自身发展和完善的历程，但基本假设即人类学者研究的深度如何完全取决于在工作中被研究对象接受的程度。田野工作要求观察的准确性，研究者需要与被研究者生活在一起，学讲他们的语言，亲自观察他们的习俗。通常要求受过专门训练的人类学家在其研究的民族或地区生活一年（或一年以上）的时间，用参与观察和亲身体验的方法来获取充分、翔实的民族志资料。即使研究本文化或者研究自己生长村落的“家乡人类学”，同样也需要高质量的田野调查。这一点，费孝通先生很早就认识到，学习社会学必须联系实际，必须到社会实际中去观察、分析和思考。由于实地调查方法是从人类学那里学来的，所以费孝通先生认真地去找人类学家学习，师从史禄国教授。考虑到具体的研究课题、研究对象和研究者本身具备的条件不同，我们不能生搬硬套具体的时间要求，但离开了观察的准确性和深度，田野调查就达不到预期效果。

其次，田野调查方法在中国尤其具有深刻的意义。如果按照“大传统”与“小传统”的划分方式，可以说长期以来国人主流思维模式深受儒家文化“大一统”和“同一性”思想的“大传统”影响，从“天下为己任”、“天下大同”、“天下为公”等中国人习以为常的话语中可以看出，儒家追求普世的法则，强调“同一性”，这固然有其积极的一面，但也使读书人和知识阶层很容易潜移默化地忽视地大物博、人口众多的中国“小传统”和民间文化中还存在着如此多的差异。费孝通先生也曾指出：“到实地去是我们认为最正确的求学之道。这一点也许和我国传统的见解不十分相合。以前的学者认为学问是在书本上，这种见解有两点是不很正确的，第一点，他们假定我们所需要的知识已经为前人获得；第二点，他们假定前人所获得的知识已经写在书本上了。我们若不能接受这两个假定，自然应该另辟新路。”^①笔者认为中国国情非常复杂，人口和民族众多，不同区域、不同职业群体的亚文化丰富，了解这样多元的社会，人类学田野调查方法有其独到之处。今天，田野调查的新路早已由前辈学者开辟，但仍需发扬光大才能更好地推动21世纪人类学的发展。

再次，是田野调查的“兼容并包”问题。调查研究并不是人类学的专利，田野调查方法也不只为人类学者独擅。从认识论上讲，田野调查的认识基础与

① 张冠生：《费孝通传》，群言出版社2000年版，第175页。

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有相同的地方。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把科学的实践观点和辩证观点引入认识论，掀起了认识论的一次革命，揭示了认识的能动反映性、社会历史性、辩证发展性特征。而田野调查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实践，深入实地进行参与式观察、深入访谈等调查研究。由于“实践”在中国深入人心，深入的田野调查不仅是人类学的传统，也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传统。黄宗智称：“其实费孝通那样的研究，从广义上来说正在学术上体现了在中国革命过程中所形成的认识和调查研究方法。”他称中国形成了世界上最重视社区田野调查的社会科学传统，“在国外，只有人类学才用这样的认识方法，而它主要用于对其他民族的研究，一般不会使用于本国的社会。但是在中国，深入现场调查研究则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研究方法，不仅在人类学、社会学领域，就是在历史学、经济学、法律学和政治学也常常如此。”黄宗智甚至认为，中国以农村包围城市的革命经历的认识基础可以说是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参与式调查。^①当然，我们说因为研究主题不同、目的不同，一般社会科学的实地调查没有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要求高，其往往追求通过调查达到对单个问题透彻了解的目的，而人类学往往运用整体观去研究文化，去展开调查，一个受过训练的人类学家虽然有时偏重于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如宗教行为等，却会很自然地意识到文化的每一个方面都是和其他方面相联系的。就宗教而言，一种文化的宗教信仰不仅影响着该文化公开的宗教礼仪活动，而且与他们所吃的食物、各种日常活动、家庭结构等都有联系。人类学家可能会强调文化和人类行为的某些方面，但一个文化完整的特征是不能通过孤立的研究文化的某一方面而认识的。尽管如此，不同学科甚至党政机关在长期的实地调查中总结的调查研究方法仍然需要人类学去正视，在批判中借鉴其精华。因此，人类学不能故步自封，盲目自信和自闭，要吸收别的学科实地调查积累的经验，同时也要加强跨学科的交流，把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好方法推广到社会科学中去。

第四，田野工作对人类学家来说是基础，但它并不是人类学家唯一的职责。人类学家一方面应用自己的工作获得第一手资料，另一方面也要善于运用，尤其是有鉴别能力地运用其他同行的成果和一切文献资料，这也是中国人类学历史研究取向的原因之一。

人类学的代表作以小型社区切入做深入的文化分析的民族志研究比较多。这就引出了人类学所研究的个案的代表性问题和研究视野的问题，甚至有人误以为人类学的研究仅仅是个案研究。有必要澄清的是，人类学绝非简

① 黄宗智：《认识中国——走向从实践出发的社会科学》，《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单的个案研究，人类学从不缺乏宏大视野。就学术训练来讲，比较好的途径是走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的路子。民族志并不等于个案材料的堆砌，也不是简单的经验性研究，马凌诺夫斯基认为：“民族志田野工作的首要理想，在于清晰而明确地勾画出一个社会的构造，并从纠缠不清的事物中把所有文化现象的法则和规律梳理出来。”^①关于“人是什么”的问题一直是人们孜孜不倦的话题，也是人类学家致力于解答的问题，而发现“文化的规则”是人类学家解决“人是什么”的钥匙，是人类学最重要的主题。但发现“文化的规则”需要有更加具体的研究方法和路径，人类学创造了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入手的方法。通俗一点讲，从个别的民族、单一的村落研究到区域的整合研究其实就是从点到线到面的研究。

从人类学早期的学术渊源来看，一直在运用从点到面和点面结合的研究方法来回答与人类有关的宏大问题。人类学进化论学派以及马克思恩格斯对人类社会发展的研究可谓极具宏大视野，他们将所有的社会形式放入一个线性的模型中，线性模型的两极分别是先进（文明）与落后（蒙昧），这样世界上已知的一切社会形式包括现存的和历史记载的都可加以比较衡量，而当时现存的原始社会无异于研究人类“落后”阶段的活化石，因而需要进行“点”的深入调查和“面”上的定性判断。这种单一的价值标准最终被多元价值观所代替，后来出现了单线进化与多线进化、一般进化与特殊进化等学说，但人类学对文化本质的研究一直是最重要的命题，通过文化本质来研究人类本质。对文化本质和文化规则的研究，无论是单个村落、部落的文化本质还是族群与区域文化的本质研究，都需要超越纷繁复杂的日常生产、生活表象，了解蕴藏在被研究对象和被研究文化之后的规则和逻辑，把实践行动者自己没有用清楚的语言表明的道理，经研究者的再创造用语言表达出来。对于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更需要超越个案和调查点的局限，立足田野调查，结合文献资料和社会历史宏观分析，总结一般的理论与方法。

从研究的积累和层次上看，人类学者从单一的村落研究、个别的民族开始到族群与区域研究再到泛文化比较研究符合客观规律。单一的村落研究好比人类学者在学科中学走路的阶段，族群与区域研究好比跑步的阶段，泛文化比较研究好比起飞的阶段，不经历前面的阶段，不打下相应的学术根底，一开始就介入泛文化、介入宏大视野的研究，往往容易流于空谈，好比空中楼阁。但我们不能永远停留在微观的层次，而要循序渐进，逐步地介入中观（族

① 马凌诺夫斯基著，梁永佳等译：《西太平洋的航海者》，华夏出版社2002年版，第8页。

群与区域研究)、宏观(泛文化比较)的领域。从整个中国人类学界目前的积累来看,需要将研究重心逐步转入族群与区域研究,才能更好地进行人类学研究工作。当然,对于研究生和学术接班人的培养,还得老老实实在地经历各个阶段。

历史的积淀形成了传统。在漫长的人类学学科建设过程中,人类学田野调查成为人类学教学的基础。作为一门实践性极强的学科,人类学以理论指导实践,以实践充实理论,学生的田野实践能力与科研创新能力呈互为因果的关系。自我系复办以来,田野实习一直是我系针对本科生开展的除课堂教学之外最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它不但是人类学学科调查与研究方法论体系中的“传家宝”,也是我系培养本科生综合能力、提高本科生综合素质的“传家宝”。为了巩固、增强本科生的人类学专业知识、理论方法,以及开发、提高本科生实践能力,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为本科生开设各类田野实习。这类田野实习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与科研相结合。本科生做人类学研究,的确存在理论体系薄弱、经验构架不齐等缺陷。但在本科生阶段的田野实习中,有意识地让学生参与老师的科研项目或有意识地培养学生独立承担科研任务,则可激发学生的主观能动性和创造力。因此,我系针对本科生的各类实习中,增加了科研的成分,并尽量将本科生纳入老师的科研项目中。

二是与教学内容相结合。人类学的本科生应算是人类学科的初学者,他们的大部分理论知识来自于课堂,他们必须有足够的时间来接受教科书中所讲述的理论与方法,因此,为人类学本科生开设的各类田野实习,都要考虑与教学内容紧密结合。这也正是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田野实习的初衷与原则。

三是与学生兴趣相结合。兴趣是一切尝试的最初动力。我系为本科生提供的田野实习,充分考虑到了与学生的兴趣相结合,如组织学生到深圳民俗村考察,让学生在尽情体验少数民族风情、领略异族风光与文化、与少数民族人民齐舞共乐的氛围里达致对少数民族文化的理性认识。

四是与勤工俭学相结合。我系在各种田野实践中尽量为学生提供一定的资金报酬,这使学生在专业知识的同时获得勤工俭学的机会,让学生更好地领会“知识有价”以及人类学的社会经济价值。我系学生参与导师的横向课题一般都有一定的劳务报酬。

现在,11本沉甸甸的田野报告集摆在案头。这11本报告集依然循着总体的学术关怀和基本理论与方法的指导,在具体的写作上则根据所研究族群和地域的侧重点以及实际需要来展开论述,呈现出了丰富多彩的形式。《龙脊双寨——广西龙胜各族自治县大寨和古壮寨调查与研究》采取了大寨红瑶和龙脊

古壮两个族群进行比较研究，全书把调查和研究很好地结合起来，分调查现状和综合研究两大部分展开论述。研究的内容主要包括村寨的经济与生计模式、婚姻与家庭、民俗、宗教信仰、宗教、歌谣、乡村教育、扶贫等。调查以现状为主，希望为读者展现两个毗邻而居的少数民族村寨——瑶寨和壮寨的生活全景；综合研究部分通过分析壮、瑶村寨所蕴含的乡村秩序，探讨山地少数民族村寨的社会结构。《黄姚古镇——广西昭平黄姚古镇调查与研究》以专题论文，如经济生活模式、婚姻、家庭、宗族、医疗保健、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的形式展开调查内容，叙述了广西壮族自治区东部一个古镇持续经年，目前依然鲜活的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广南阿科——云南广南阿科乡经济发展与社会文化调查与研究》分为11章，分别是自然环境、农业生产及居民生活，经济发展现状及未来规划，壮、汉、苗、瑶民族关系，亲族组织与社会网络，婚姻家庭与社会性差，教育类型、内容与人格形成，壮族的龙树及其变迁，疾病、治疗仪式与神灵观念，观音洞与民间信仰，苗族村寨的适应与变迁，瑶寨的社会组织与传统文化，较好地反映了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阿科乡壮族、汉族、苗族和瑶族共生互融的文化全貌和社会发展。对居住在贵州省水尧、永康和三都等地的水族人群的叙述与研究则以田野调查的内容展开论述。这些报告集各有特色，充分体现了带队老师和全体实习学生的辛劳和汗水，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也是学子成长的见证。

中国的21世纪是变迁的时代，就像泰勒在《原始文化》中所讲到的那样：“我们有幸生活在一个智力发展史和道德发展史上充满大事而多变故的时期，此时那经常掩闭着的发现和变革之大门洞开。”我们所开展的田野调查，不仅引发了学子对人类学的兴趣，也引起了学生对人生、多元文化价值和民族地区发展的更多、更深的思考。从调查中我们发现，文化变迁是如此的迅速，很多时候，当事人还没有来得及反应就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感觉走了。反思我们这些生活在都市里的人，何尝不是这样？社会文化变迁形成的时尚、潮流等主流价值观往往淹没了时人微不足道的反思，更何况是对年轻人，喧嚣的流行文化之后是一片终极意义追求的苍白。谁也不用思考人类将走向何方，由跨国企业和大众传媒催生的消费主义，使人类沿着掩盖在科学光环下的能源消耗之路越走越远。部分村寨的调查反映出民族文化断裂使少数民族面临诸多的不适应；也有一些村寨里的少数民族还没有真切体会和零距离接触都市世界，他们的生存还只是对环境的简单适应，一些偏远山沟里的少数民族虽未与世隔绝，但远离所谓的现代文明。这两种迥异的生存发展

之路，究竟是哪一种好呢？相信不同的读者看完调查报告集后会有不同的答案。我们怎样研究他们、认识他们也仅是一种答案，我们的结论也只是一孔之见——这个世界本来就没有什么绝对的真理和唯一的视角，然而正因为有了不同的视角和生活，人类也才有了更多的遐想，文化因而更加丰富多彩，意义的追寻之路也就更加富于挑战！



目 录

总序（周大鸣）	i
前言（何国强）	1
贵州兴仁苗族（黑苗）、彝族和布依族体质特征研究（陈华等 12 人）	9
少数民族村落社会的权力与控制（陈杰）	24
西部少数民族地区旅游发展前景（陈华）	52
标语口号掩盖下的乡村生育文化与医疗保健（阮洛瑶）	86
鲤鱼片区的家庭与婚姻研究（张丽霞）	193
兴仁县鲤鱼村的村民谋生模式（吴海明）	221
鲤鱼村的社会精神文化生活（张宗敏）	246
黑苗服饰实录——以屯脚黑苗为例（李霞）	296
鲤鱼民间文学艺术考察报告（陈洲）	356
鲤鱼小学校史（唐凯勋）	398
后记（何国强）	435

前言

何国强

贵州是中国多民族的省份之一。苗、布依、彝等民族在这里创造并保持了各具特色的文化，它们不仅是贵州少数民族的宝贵财富，而且还是灿烂的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本报告集叙述的是黔西南苗族布依族自治州兴仁县屯脚、大山二镇的苗、布依、彝等民族的体质特征、物质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

调查研究是在2004年开展的。调查队由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民族学专业10名师生组成，其中有2名教师（何国强、陈华）、1名硕士研究生（陈杰）、7名本科生（按姓氏笔画排列为阮洛瑶、吴海明、李霞、张丽霞、张宗敏、陈洲和唐凯勋）。是年五六月之交，先派员到黔西南摸底选点，七八月全队人员赴兴仁县东南部屯脚镇、东北部大山镇正式开展调查，9月写成初稿，11月修改完稿。

田野工作分为体质测量与文化调研两部分。体质测量的民族是黑苗、布依和彝。文化调研的对象是屯脚镇鲤鱼、啞啦、坝桥和大树四个行政村的黑苗与布依。调查内容包括他们的婚姻、家庭、谋生方式、生育、医疗保健、服饰、社区权力与控制、精神文化（人生仪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娱乐方式、民间文学艺术）、教育、旅游等。

本集子主要体现了苗、布依、彝三个民族的文化。其中，黑苗最多，布依次之，彝族较少。以苗族为调查研究的重点，是与以往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重点一致的。

苗族历史悠久，人口较多。早在先秦典籍中，即有关于苗族先民的记载，随着社会发展和苗汉交往的扩大，对苗族的记载不仅出现于正史和官书，也出现于私人著作。

人类学对贵州苗族的研究,外国学者中首推乌居龙藏(1870~1953年)。20世纪初,他深入中国西南研究苗族,1907年在日本出版巨著《苗族调查报告》,轰动国际人类学界。

中国学者对贵州苗族的实地研究始于民国时期。吴泽霖(1898~1986年)、林耀华(1910~1999年)、陈国均、杨汉先等率先作出了贡献。

吴泽霖自1938年起,直到1956年,在黔东南苗族、布依族、水族和侗族聚居区做过大量实地调查,先后发表《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1939年)、《炉山黑苗的生活》(1940年)、《贵州省清水江流域部分地区苗族的婚姻》(1958年)等几十篇文章和调查报告。

林耀华的博士论文是研究贵州苗族的。1940年,他将梳理文献的考证式叙述以《贵州苗民》为题,发表于英文《亚洲研究学刊》。^①

新中国成立之后,贵州的民族研究呈现出新的面貌,出版了《兄弟民族在贵州》、《苗族简史简志合编》、《中国苗族通史》等著作。

与此同时,国外人类学工作者对贵州少数民族的研究也在深入进行。20世纪80年代末,美国人路易莎·斯凯恩(Louisa Schein)开始对黔东南、黔西南苗族地区做调查,1993年写出博士论文《流行文化和差异的形成:苗族与中国》^②,2000年出版《少数民族的准则:中国政治文化中的苗族和女性》^③一书。100多年来,政府官员、艺术家、摄影师、记者和旅游者,也相继涌向贵州民族地区。他们自诩为少数民族“话语”的生产者,以自己特有的方式介绍那里的风土人情,帮助人们理解苗、布依、彝等民族的文化。

兴仁县地处西江上游南盘江与北盘江的分水岭,县境属于南盘江流域的面积小(仅有226.1平方公里),属于北盘江流域的面积大(有1558.9平方公里)。我们的测量与调查在大山镇(属北盘江流域)和屯脚镇(属南盘江流域)展开。故集子的主标题用“盘江”一词表示南北两条盘江,“识略”意谓此次调查奉献的是初级水平的研究成果,只是两江流域民族的概貌。但是,调查队测量的活体不算少,他们对鲤鱼等村庄作了细致入微的透视,由此获得的认识或可折射出兴仁县乃至黔西南民族文化的某些共同性。这种解剖“麻雀”的方式,或可作为引玉之砖,留贻同行,提供参考,树为仪范。

① Miao-Man People of Kweichow.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y, Vol.3, No.5, 1940.此文由蓝林友等译出,收入林耀华:《从书斋到田野》,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37~404页。

② Schein Louisa. Popular Cultu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Difference: The Miao and China. Ph. D.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1993.

③ Schein Louisa. Minority Rules: The Miao and the Feminine in China's Cultural Politic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单点研究与多点研究是彼此兼顾的。这一方面是由于“大聚居、小分散”是中国民族分布的特点,国内任何一个民族都不是生存在与世隔绝的小社区内,而是与外界有各种交流。另一方面,通过比较才能够更加深入地认识一个民族。兴仁县鲤鱼坝、陈家沟、木桥、长青等地的苗族是从黔东南的黄平、凯里、台江一带迁来的^①,故描述鲤鱼坝一带的黑苗,对于厘清兴仁县陈家沟、木桥、长青的苗族,以及比较黔东南的黄平、凯里、台江一带的苗族文化是有意义的。而描述鲤鱼村苗族、布依族、汉族的关系,对于了解贵州各地三族的关系同样是有意义的。现代化背景下的屯脚镇苗族、布依族、汉族村落,民族关系出现一些新特点:各民族的民族意识都很强烈,但并未加大各民族的距离,相反,经济、婚姻、文化等方面的联系促进了不同民族的紧密合作。

研究民族文化,女性的地位极其重要。人类的一半是女性。在社会生存的功能上,妇女是绵延族系的关键纽带。妇女对社会各个方面都有自己的看法,对有些现象甚至了解得比男性还要多。“她们就是活的社会文化的残片”^②,通过妇女来了解妇女,是了解社会整体的必不可少的环节。家庭生活、妇女活动的观察与询问,对她们内心世界的揣摩和体验等,无不需要女考察员来承担。男性去了解妇女有诸多不便,妇女的事情男人也不易了解透彻。美国人类学家博厄斯一再鼓励女学者参加民族调查。在中国民族学的实践中,过去从事田野调查的女性是十分稀少的。1950年以后,许多女性参加到少数民族的民族识别和社会历史调查中来,但女性的数量依旧比不上男性。尽管社会需要,女性参加调研确有其必然性,但是,民族地区生活较为艰苦,有些困难男性都受不了,何况女性。这次赴兴仁进行民族调查,有4位年轻的队员是女性,她们和男性一样克服困难,努力工作。她们的询问极其周密,她们的观察和记录极其细致,在家庭、生育、服饰、仪式、娱乐等方面,展示了女性的天地。

本集子汇合了10篇文章,偏于记实叙述而少于理论分析,故题为“调查报告”以副其实。

第一篇报道了苗族(黑苗)、彝族和布依族的体质特征。实测600人,每个民族200人,男女各半。测量指标为35项,计算了7项指数。其中,直接测量27项,间接测量25项。各项数据置入24个表格。

经过统计分析,得出四个结论:

(1) 兴仁县的黑苗、彝和布依具有西南人群的体质特征。

① 贵州省兴仁县编史修志委员会:《兴仁县志》,贵州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6页。

② 吴泽霖:《水家的妇女生活》,载《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29页。

(2) 兴仁黑苗的头长宽指数多为短头型到长头型, 头长高指数多为正头型到高头型, 头宽高指数多为狭头型到中头型, 形态面指数为超狭面型, 鼻指数多为狭鼻型到中鼻型。

(3) 兴仁彝族的头长宽指数多为短头型到中头型, 头长高指数为高头型, 头宽高指数多为狭头型到中头型, 女性还有较高比例阔头型, 形态面指数男性全部为超狭面型, 女性为中面型到超狭面型, 鼻指数多为特狭鼻型到中鼻型。

(4) 兴仁布依族的头长宽指数多为中头型到短头型, 头长高指数为正头型到高头型, 头宽高指数为中头型到狭头型, 形态面指数为超狭面型, 鼻指数为狭鼻型到中鼻型。

我们没有急于与先前学者对其他族群的体质测量指数进行对照^①, 就发表了实测的数据。我们只考虑一个目的, 就是想尽快把反映黑苗、布依、彝的体质情况的真实数据公布出来, 让其他研究者自行处理, 而不是因为我们暂时没能深入比较, 就把数据束之高阁, 不让他人利用。

第二篇报告以鲤鱼的几个村庄为样本, 叙述和分析了民族村落社区的权力与控制。作者认为, 在现代化进程的推动下, 乡村的权力和文化变迁加剧, 民族地区社会秩序的复杂性更加明显。作者对屯脚一带的社会沿革, 当今社会秩序与权力控制情况作了描述和分析, 突出了民族杂居和民族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在地方与国家的互动关系中的位置, 反思了如何整合民族传统文化的权威资源与现代国家的政法体系, 使社会秩序保持动态平衡。

第三篇是关于旅游的报告。从自然旅游资源和少数民族风情旅游资源角度介绍了兴仁的情况, 提出当地大力发展既具有少数民族特色, 又具有现代吸引力的旅游业的对策。

第四篇报告以一个村庄铺天盖地的标语口号为引线, 对传统生育文化的内涵作了层层推进式的探索。描写细腻, 行文流畅, 充满柔情。以丰富的图、表、照片和别出心裁的安排, 串联起一个个事实, 烘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内容。报告透过现象揭示本质, 以务实的态度对待传统文化, 把握悠久的历史惯性, 一分为二地看待少数民族治疗疾病的传统方法, 指出了坐家等风俗的积极作用。例如, 在控制人口方面具有推迟生育期、头胎性别没有明显的重男轻女偏向, 没有强烈的早生、快生欲望等。

风俗习惯是对环境的适应, 有其历史背景, 就是环境的某些部分改变了, 由于惯性作用, 它也不会完全消失。社会主义的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意

^① 例如, 吴定良 1942 年发表于英国皇家人类学会《人类》期刊上的报告——《中国南方坝苗的体质特征》的数据是可比较的。

意识形态对文化制度的反作用是很大的。可是，主张现代化的人们，往往只看单一标准，力求文化齐一，日日以移风易俗为急务，殊不知风俗习惯的迅速破坏，可使人民在重新适应的过程中，顿失行为准则的凭借，造成心理上的彷徨无依，产生行动上的种种冲突。作者提到，某一计划生育部门，在上级检查之前，组织教师在一个村庄内外书写和粘贴了150多条标语、口号和漫画，造成轰动效果，这个部门也如愿以偿地得到了上级的精神鼓励与物质奖励。但他们忘记了，这是一个民族村，把“月经”、“白带”、“安全套”、“性交”之类的词语当作科普知识写到少数民族的家门口，合适不合适？再说，少数民族中不懂汉字的人居多，这样搞，宣传效果哪里去了？还有，它又是一个旅游村，经常有外地游客，甚至外国游客，人家看了会怎么想，会不会看成精神污染？今后更多的游客会来吗？最后，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里面有一套生育知识、营养知识、防病治病知识，而不是一张白纸，什么都没有。宣传计划生育没有错，但要讲究方式方法，要看时间、地点和条件。尤其要注意，推广科普的同时，要保护那些行之有效、成本低廉的民间知识。计生工作也应充分利用传统文化为自己服务，一味强调科技和现代医学是不符合实际的。

第五篇报告讲的是家庭。作者把户籍统计和实地调查结合起来，围绕家庭的形式、规模、功能、动力以及维系家庭的方式等展开叙述。报告结构严谨，说理充分，结论自然：家庭的各要素互相联系；目前苗、布依的家庭趋向小型化；核心家庭、主干家庭居多，与分家有关，而分家的增多体现了时代的发展；苗、布依人民时兴的与幼子一起过日子是当地特有的赡养老人方式，是同社会相适应的一种有效机制。作者通过上、中、下三个家庭的描写，展示了不同家庭的经济面貌。她还归纳了家庭和睦的主要因素，报道了同姓同宗不婚、跨代不婚的规则与变通，披露了从表婚、收继婚、不落夫家、民族间通婚的事例和功能。

第六篇报告关注的是鲤鱼村苗族、布依族、汉族的物质生活世界，尤其是他们的生存之道。作者从地理和历史的角度出发来解读他辛勤收集的田野素材，不仅展现出地方特色与民族特色都很浓厚的苗、布依村民的传统谋生方式，而且描绘了他们向现代化转变过程中的新型谋生方式。从传统农业、狩猎和渔猎，到渗入新技术的农业和养殖业；从外出打工及民族服饰的制作，到拿绣工艺等，无不展现了鲤鱼村民传统生计模式的传承和转变。

这篇报告敦促人们反省：推进民族福利，首先要改进民族的经济生活条件。黔西南大多数农民的经济生活水平不高，他们贫穷的主要原因不外乎耕地面积狭小、土壤贫瘠、水利不兴、资本匮乏等。这些因素，大都非个人能力所能补救改进的，非得依靠政府的力量通盘筹划。假使这些基本问题不能彻底解决，那些枝节性的扶贫与救济工作，未必能获得有补事实的效力。因此，基础工作与

辅助工作、治本与治标必须兼顾，并且，何者为轻，何者为重，是要由具体条件、远近需要来决定的。

第七篇报告提请我们注意多民族共居的村庄民族文化的保留问题。苗、布依和汉，三个民族的文化有共同的一面，但在他们的物质生活与精神世界中，也保留了自身文化的特点。本报告以翔实的材料，娓娓道出鲤鱼村苗族和布依族的精神文化生活全貌，包括人生仪式、民族传统节日、民间信仰、社交娱乐方式等几个方面，其中，民间信仰是村民们日常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反映了黑苗与布依精神文化上的不同点。此外，报告说明，三族比邻而居的历史过程促进了他们文化上的相互交流与相互借鉴，使得他们各自的某些传统文化发生变迁，并且都在朝着进步的方向不断发展。

精神文化绝不是良莠不分的。无论在哪一个民族中，总有许多风俗习惯早已失去效用，早已与当前的标准相悖，甚而有碍于本民族的繁荣昌盛。但是，文化的惰性常常使这些习俗顽固地保存着。在兴仁，一个人的丧事，尤其是老人的丧葬，其铺张程度常令人叹息不已，有时甚至弄到元气大伤的地步。有的人家，人死多年，因受债务拖累，子孙总是翻不过身来。又如，患病不看医生而请老摩作法祛邪，每次总要杀鸡宰鸭，付出金钱。有识之士要尽力劝导人们，使他们知道某些风俗的革除实有必要，因而自动去改革，移风易俗才会有成效。

第八篇是记录长裙黑苗服饰的。服饰反映的不仅是民族界线，而且更多地表现出年龄和性别差异以及随场景变换的族群认同意识。在贵州，传统上鉴别苗族的种类，外在标准之一就是女子的服饰。因为男子的服饰，与汉族农民的穿着没有多大区别。唯独苗族女子，基本上保持着原来的装束。^①所谓青苗、白苗、黑苗、歪梳苗者，即以这些女子所穿衣服的颜色、头上缠绕的帕子、所挽的发式而定。黑苗是贵州苗族的一个主干，这一主干又分若干支系，在语言风俗习惯上彼此间略有差异，长裙者和短裙者算是黑苗的主支。^②鲤鱼、啞啦、坝桥和大树四个行政村的黑苗属于长裙黑苗。作者将那里的黑苗服饰分为三个部分（服饰主体与附件、服饰制作材料与制作方法、服饰的传承），配了39幅图片，先分开叙述，继而归纳出结论：黑苗服饰作为黑苗文化心理的对应品，随时代的变迁和文化氛围的变迁而呈现出千变万化的式样。

第九篇报告记录和整理了屯脚镇的民间传说、歌谣、艺术等。作者指出：第一，民间文艺的传承是一个曲折过程，期间交织着外来文化和本地文化的磨合；第二，口传的核心工具是民族语言，如果一个民族保存不了自己的语言，这个

① 吴泽霖：《贵州短裙黑苗的概况》，载《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1~14页。

② 吴泽霖：《炉山黑苗的生活》，载《吴泽霖民族研究文集》，民族出版社1991年版，第56~154页。